

# 2007台灣文學總體觀察

彭瑞金

年度「台灣文學年鑑」，除了負起一年間台灣文學創作、研究、活動的記錄性使命之外，鑑往知來的文學省思，應是另一個重要的編製任務。

已有十多年編製歷史的《台灣文學年鑑》，記錄的使命，早已具備一定的記事體例及作業程序，何況，文學的進程及發展，循序和緩漸進是常態，爆起爆落是異象。從新書出版數量、文學作品的發表園地的消長、文學獎、文學營隊，乃至文學相關活動的記事，都可做為整體文學消長的觀察窗口。關於2007年台灣文學，這個角度的觀察，結論是完全符合文學發展史的定律的，並沒有突兀的消長現象。雖然，周芬伶〈台灣小說概述〉劈頭就引用出版人投書，指陳2007年是出版界「有史以來最慘澹的一年」，慘狀更甚於SARS事件發生的2003年。這當然是很聳人聽聞的文學訊息，但這道消息進一層指出的是本土文學市場出現冰點，是翻譯書佔去了一半出版市場，翻譯小說又佔了翻譯書九成所致。先就出版觀察並不等於整體文學觀察言，把文學生產放到商品銷售取向的出版市場去觀察，一向就是文學生產的痛腳，莫說前衛性、試驗性的作品，難得商家青睞，就是比較厚實、篤實的作品，也因缺乏「賣相」、「賣相」不佳，而乏人問津。這種「賣相」不好的情形，本土文學恐怕又要佔了極大部份。只要是不脫

離文學市場機制的觀察，就不可能脫離這樣的文學宿命。接著下面有關翻譯書以及翻譯小說市場佔有率的推估，就更有意思了，它像一面鏡子，恆在照映出本土創作篠說失血性蒼白臉孔。2007年的翻譯書市場，雖然沒有過去《魔戒》或《哈利波特》那樣的，挾電影滾出來的翻譯書風潮，所造成的出版界被「海嘯」現象，仍然造成翻譯書的「侵略」現象，還是有值得從正面去省思的地方。

立足台灣，放眼世界，一直都是台灣文學奉之為圭臬的視角，世界文學的經典小說名著的舊譯本、重要譯本，一向就是長銷書。文學史、文學、美學理論、文學思潮研究書的譯本，都是台灣文學書市的委託行。習慣把「與世界文學接軌」掛在嘴邊的台灣文學，又怎能不把新出土的經典和層出不窮的「新典」不斷地彙譯出來，以保持軌道的暢通無阻？以台灣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生產能量比，九成翻譯書，應該是健康生產的比例。這裡沒有崇洋媚外的意思，從台灣學發展的「土性」言，能從大量的文學翻譯書中汲取的文學養分和質素，應該都是有益於當前台灣文學體質的補給和改變。不過，這裡有一個不雅的比喻，就是狗肉文化的例子。民間有很多人相信香肉補身的說法，很可能是因為香肉熱量高，以致有人即使干犯法紀也要吃它，其實體質好、體力強的人，吃了是

否有補，恐怕心理作用大於生理反應，可是體弱多病的人，卻忌進食此補。概強者食之恆強，弱者食之恆弱也。台灣文學之嗜進補世界文學，無論是狼吞虎嚥還是萃取精華，真正值得省思的是自身體質。據說從《魔戒》首部曲就獲得三千五百萬翻譯版稅的暢銷書，帶給台灣文學的是什麼？台灣的神奇、魔幻小說因此進展了幾寸？其實，根本不該怪《魔戒》的進佔書市，要檢討的是我們的文學體質。也許因為翻譯小說的類、量都十分驚人，才受到出版界的注目，其實文學理論、研究翻譯書的「霸佔」現象，更值得注意。這個區塊的台灣文學，是空城、是荒村，外來文學的長驅直入，儼然形成學術的「租界」。年輕一輩的台灣文學者，要想進入租界，不要易容也要換裝，就像不學幾口洋涇濱進不了租界，不貼上一些流行術語便進不了論述的租界。台灣文學研究的怪現狀是，明明是用「土話」就可「詮釋」清楚的，一旦「學術化」、「理論化」之後，就把人帶去騰雲駕霧了。這也是「翻譯」造成的台灣「香肉」進補不適症。

談到台灣文學書翻譯西方文學理論、文學思潮、文學史書籍的問題，市場上，由中國方面進口、或和國內合作出版的問題更為嚴重。這方面不是量的問題，而是質的問題。中國方面對西方文學理論、思潮、文學史方面的翻譯，有很大部份都採摘譯、選譯、意譯、譯述，或多人合作的譯法，且常不註明。很少全譯、直譯。「水平」又多參差不齊，貿然食用，後果可能比吃「香肉」還要嚴重。

持開放的心態發展台灣文學是必要

的。走過台灣封閉年代的台灣人，一直有一個不正確的「想像」，總認為歐美社會比台灣社會開放。事實上，他們的社會對於開放的法令和海關實務，都有比我們嚴格百倍的機制，台灣反而像不設防的天空。也許國土空間的防禦系統，比較難於作想像的類比，就以個人的身體為喻，台灣文學的免疫功能太低，才是屢屢遭病菌入侵的主因。看來，強身健體，似乎才是我們當前能做、要做、必做的事，盲目吞食、進補是最不迫切需要的事。誤食、中毒足戕害身心，鍛鍊體魄、健身強心，也不是一蹴可及。2007年的台灣文學界，從官方的文學事務主管機構，到民間的文學團隊，從團體到個人，從文學研究機構到創作者，基本上，都在運動向前，沒有人能保證，沒有誤食、中毒的情形，也沒有敢貿然肯定所有的練身強心之道，一定獲得正面的效益。畢竟我們是小國家，要想成就大文學，以開放的心態看台灣文學的發展是必要的。

台灣文學想要以小博大，對內除了需要開放的心態，還需要務實的作法。具體地說，台灣文學的宏遠理想抱負，需要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走。過去對弱勢族群的扶持，就是基於建構真正多元台灣文學的宏大理想，當前急切需要的是對弱勢文類、作者的護持，才有未來花園錦簇的台灣文學花園。以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的台灣文學獎為例，把過去徵文性質文學獎，改成獎勵圖書出版（長篇小說、新詩二類），都具備一定遠見、宏觀的台灣文學推廣策略意義。用百萬元獎助一部長篇小說，雖不是天文數字，卻足以宣示對長

篇小說創作區塊的重視。劇本創作代表的台灣文學完整版圖裡的戲劇發展，一直是殘缺的一塊，設獎徵集劇本，只是起步，但在補圓填缺台灣文學版圖而言，具有破天荒的創始意義。過去，也有民間文學團體及地方政府所設的文學獎，設有戲劇或劇本獎，大都績效不彰。原因在於戲劇劇本的獎助範圍太大了，從電影、電視、舞台到野台，從傳統的歌仔、布袋到現代劇，要分門別類設獎項，到底要獎勵誰好呢？全方位照顧，根本是足以淹沒、吞併整個文學的大工程，何況，劇本獎只是獎掖劇本創作，沒有演出獎勵，豈不是過乾癮？或要獎助到演出，則茲事體大。至於獎勵圖書出版（新詩類），寫詩容易，發表也不難，出版詩集明顯不容易。這項獎是肯定詩人一定程度的成就，對現代詩的發展而言，旨在做階段性的推昇。一般的詩創作徵文獎，可能助產好詩，徵選詩集在獎掖寫詩的人成為詩人。長篇小說可以說是被網路文學時代打破的文類，長篇小說的紙本寫作者，想要孜孜矻矻地寫完一部大部頭的長篇小說，往往得經年累月的功夫，寫完了乏人問津，三餐無以為繼的現實，肯定沒有動力再去嘗試。如果台灣文學的長篇小說創作區塊，成了惡地、荒泉、廢墟，發展台灣文學云云，肯定是空談。邁入21世紀之後，台灣長篇小說創作有活絡的跡象，主要還拜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及皇冠出版社等的長篇小說創作獎、補助計畫，民間出版社願意出版這些獎補作品，也有莫大的文學功德。相較之下，長篇小說的創作者，還需要更多更大的「專業」寫作機會和空間。長篇小說獎，

多多益善。

目前堪稱屬於建構階段的台灣文學，有許多盲點、弱點，針對盲點點燈、照明，針對弱點補強漆工，乃是省思的終極目的。國立台灣文學館在整體台灣文學公共資源的支配上，居於總理的地位，也許還稱不上全面顧及這些弱點、盲點，卻不能不肯定這樣的方向，從濟弱扶傾出發。

以上是從台灣文學的橫切面省思，我們不僅不希望看到缺角、凹陷的台灣文學版圖，也看到了努力填補的效益。但在斤斤計較出版數量和各文類出版盛衰消長比較的同時，今昔之比，也是文學年度觀察的重點。前面談到翻譯書的比例問題，出版界認為翻譯書侵佔了本土文學的市場，很不像商人給人的無祖國印象，卻忽略了台灣文學書生存的另一重大危機；中國作家的作品、正以螞蟻兵團的策略，攻佔台灣的出版市場——台灣作家的生存空間。這不是個人的小器想法，也不是對世界文學持寬容寬大獨薄中國，而是由簡體中國字直接轉化為繁體中文字在台灣出版的中國當代作家作品，根本就是沒有經過海關入境的偷渡客，出版商不把它當外國作家看，讀者也不知道讀的是外國作家的作品，對台灣文學造成的衝倒「國防線」現象，影響才是重大又長遠。學院裡把王安憶、嚴歌苓、蘇童，當作「我們的作家」論述、研究，早已不是新聞，拆穿這道文學的國家防線的始作俑者，正是出版商。

把簡體中文直接轉化為繁體中文之非必要性轉換，就有欺瞞之嫌，對喜愛讀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讀者，轉換是多餘的，直接進口中國出版品是省錢省事不幹，費



錢費事翻成繁體，不是想以「大陸作家」掩護「中國作家」混充「台灣作家」——「我們的作家」、是什麼？文學出版商不把這種中文的簡繁轉譯、計算在翻譯書的範疇內，就是把它算在「本土文學」的出版計項內，不就是計算來台灣的外籍觀光客時，不計算直通的中國客，也不計算不經海關的偷渡犯？其實，只有偷渡犯直接衝擊台灣的就業市場。

廖瑞銘在〈台語文學概述〉的結語中感慨指陳，90年代完全解嚴的台灣，反而走向「去國家化」和「去文學化」兩種路徑。他說，台灣的文學史告訴我們，從1920年代到80年代，都可以看到與台灣歷史情境相對應的台灣文學。換句話說，在90年代刑法一百條修廢以前、言論受限制的年代，國家主權意識受壓制、人權被剝奪，文學和時代的對話主題，不是自主意識就是主權捍衛。但在思想解嚴的開放年代，文學與歷史情境的主體性、自主性對應，被批責為意識形態掛帥，損害了文學的純粹性，破壞了文學的清純。姑且不論這種反台灣文學本土化，反台灣文學與追求台灣人主體性、自主性歷史對應的言論，是否在為他們內心的「虛幻中國」預佔位置，但指責他人意識掛帥的意識掛帥者言論，已然達到模糊台灣文學國家意識的陰謀。在前引的長篇小說創作、詩集、劇本……中，都有明顯的拒絕與台灣歷史情境對應的去台灣化現象。

中國作家在台灣出版的長篇小說，除了不能參加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的百萬獎金徵選之外，享有的榮寵一項也不少於本土作家。這些作家的作品，和台灣歷史

情境的對應是零，這些作品與台灣的主體性、自主性追求，是背道而馳。看起來十分熱鬧的戲劇，則以「傳統與創新」刻意置國家意識於罔聞。戰後的國策文學把文學公器私用，做成御用宣傳品，將「國家文學」污名化了，使得台灣作家致力於對應台灣土地、人民、主權建構的「台灣文學」，也被順竿打進國家文學的污地。如果台灣戲劇，能謹守藝術歸藝術的純淨藝術，而拒絕國家意識進駐，還可以被尊重的理解。實際上，台灣戲劇既不以「傳統」的建構者自居，反而奉中國京戲、豫劇、《水滸傳》、《梧桐雨》……為傳統。把中國傳統戲劇的分香分店為台灣戲劇的「傳統」，卻大言不慚，不受「國家意識」干預。說白話就是，拒絕實質的台灣人民、土地、主權的台灣意識進入台灣戲劇，卻堂而皇之地迎奉中國傳統，豈不羞辱了「傳統」兩個字？在這樣的傳統詮釋下的「創新」，不談也罷。

去國家化思惟的台灣文學發展現象，嚴重斷裂了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情境對應發展的傳統。但對於以還給文學純淨創作空間而拒絕與台灣意識——台灣的土地、人民、主權的遁辭。或者以創新為名，與世界接軌為詞，將台灣二字虛擬、空洞化為華文文學的現象，並不需要「過慮」，沒有土地就沒有文學，沒有人民也沒有文學，虛擬、虛幻，都將不攻自破。

廖瑞銘指出的「去文學化」現象，雖然是世界性的文學研究風潮，西方文學理論發展出來的、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學研究現象，但也不妨樂觀地把它看成只是風潮趨勢，物極必反，這樣的路走到盡頭的時

候，風潮撞到牆壁的時候，自然趑回來。台灣的文學研究，年輕又脆弱，一向呈現的就是海島文化的陽性反應，不隨著世界風潮飄搖才是怪現象。面對這樣的現象，其實要認真嚴肅面對的是文本創作和文本閱讀的問題。如果把握創作這一關，讓源源不絕的創作，多樣而豐富又不斷創新的作品出線，創造出文學理論永遠在後面追趕不及的榮景，自然可以重挫以理論套文學的霸道。因此，值得憂心的只是，甘心被理論風潮上枷鎖的作家的傳承。此外，研究偷渡犯文學也是虛化、空化自己的文學的歹模樣。台灣文學本身，如果能加強文本閱讀解說的區塊，有更多正面面向台灣作家、台灣作品的研究被肯定、被獎掖，可能比空口的對抗、徒有口號的精神武裝更有效。

邁入21世紀之後，台灣文學發表的園地，除了報紙副刊撤退、失守，有些雜誌奄奄一息之外，只剩「文學獎」還偶然喚醒的文學創作熱情，但放眼台灣社會大大小小七十幾種文學獎項，有幾個是標舉文學創作與台灣歷史情境對應作品的文學獎？台灣文學各文類創作，因徹底解而精神虛脫的現象，當然不可能在2007年一年獲得仙丹妙藥而一舉改善。文學的解構顯然比建構永遠容易些，隨便放幾顆「台灣文學不要意識掛帥」、「台灣文學要與世界接軌」、「還給台灣文學純淨的創作空間」……的煙霧彈，辦幾場「偽」台灣文學的研討會、文學營，就能像潑油漆那麼容易讓台灣文學變貌、毀容。這麼說，並不表示台灣文學內在結構的脆弱不堪，只是強調台灣文學在21世紀反常在霧幕中前

行的現象。何以在進入新世紀之後，已有不少台灣文學研究的系所在學院中出頭，也吸納了可觀的研究學者加入台灣文學研究陣營，所謂榮景可期的階段，反而陷入濃霧中迷航的窘境？癥結還在前述的「去國家化」和「去文學化」，也感染了學院裡的台灣文學教學和研究。也許學院裡的「去化」程度，無法提出全面確切的數據來證明，但從大學裡的成立不及13年的台灣文學、語言研究所或撤銷或更名的比例，所傳達的訊息，就可以清楚收到這是警訊。改名和撤銷都是以拉開台灣文學的擇離或稀釋文學的研究主體地位為目的。其實再去檢視快要進入「量產」期的博、碩士生學位論文題目，或每年在申請國立台灣文學館碩、博士論文獎助的論文名單，都是出現文化研究，甚至歷史研究淹沒台灣文學作家、作品研究的去文學化現象。

從去化現象，引出的是台灣文學發展史裡，台灣精神、台灣意識陷落的嚴重性，但也令人想起一些斤斤計較的台灣文學版圖的爭執—有人擔心小說的版圖減縮了，有人憤怒於母語文學的空間受到擠迫，有人為戲劇的園地、資源太小請命……，相對於去化問題，這些圖塊大小的計較，豈不是佔了位置卻被人除了名？沒有了頭，留著身子何用？作為年度的文學總體觀察，本文無意傳達打擊軍心士氣的負面訊息，只希望發出的是一生驚醒人心的訊號。如果我們的創作者和研究者，能用自己的龔力和智慧，去穿透這迷霧看到後面的真實的台灣文學再往前走，台灣文學的前景仍是可以樂觀的。迷霧籠罩大

地的時候，放低身體、貼近地面，反而更容易找到出路。其實，從年鑑的文類概述、著作、出版選目，乃至文學大事記，可以發現的確有人根本不理會天氣陰晴、不論下雨天濃霧天，或孜孜於創作，或埋首於研究，或致力於文學文獻之整理修補，或投身文學讀本之編製、解說……，貼近台灣文學的主體為台灣文學做工，台灣文學仍有充滿希望的未來。